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 论资产阶级法权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資 產 階 級 法 权

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  
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室 編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資產階級法權  
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室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58年9月第一版 1958年10月第二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42· 2印張· 33,000字

印數:100001—165,000册 定價: (5)0.19元

統一書號: 3 2086 · 65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对資產階級法权的批判，散見于他們的許多著作中，由于条件和水平所限，这里搜集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每个題目下的材料大致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发表的順序編排的。

## 目 录

一、法权和經濟基础的关系 .....	1
二、消灭私有制問題 .....	5
三、消灭阶级和平等問題 .....	6
四、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中的 资产阶级法权問題 .....	13
五、平等和平均問題 .....	28
六、无产阶级国家公务员的薪俸問題 .....	41
七、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品分配問題 .....	44
八、人的精神道德面貌 .....	52

## 一、法权和經濟基础的关系

我所得出并且后来成为我以后一切工作的南針的總結果，可以簡單扼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了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会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種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借以意識到這種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為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

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恰恰相反，这种意識正須从物質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頁）

我的专业本来是研究法学，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門附屬科目拿来与哲学和历史一同进行研究的。

我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結論如下：法权关系，也如国家形式一样，不可能从它們本身中得到理解，也不可能从所謂人的精神一般发展过程中得到理解；恰恰相反，它們是根源于物質生活关系，黑格尔曾按照十八世紀英法两国作家先例把这些关系的总和称为“公民社会”，而对于公民社会的解剖則应当在政治經濟学中去寻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340頁）

然而这当然并不是說：社会主义者放棄特定的法权的要求。如同一般地、不論任何政党都如此一样，活动着的社会主义政党沒有法权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个阶级的共同利害中产生出来的要求，只有經過这个阶级获得政治的权力，用成文法的形式来把一般的效力授与这个要求之后才能实现。不过各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的和政治的变迁的經過中变动着，它又在各个国度中跟着它的特点和社会进化的高度变異着。从而不待說，各个政党的法权的要求，尽管和它的終极目标完全一致，但在各时代各民族中

并不完全一样。它包含可变的要求，时时被修改着，一看各国社会党就可以知道。当修改这些要求时，被引进到考虑中来的是实际的情形，反之，想把它的綱領作为材料来編成一部新的法权哲学，这是現存任何社会党都沒有想到的。即使将来也絲毫不会想象这件事体。

（恩格斯：“法律家社会主义”，見“新建設杂志”，第1卷第7期，第18頁）

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經濟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經濟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結果。不，这里始終是由在經濟必然性基础上发生的交互作用归根到底为自己开拓道路。……并没有什么經濟狀況自动发生的作用，象某些人认为簡便起見而設想的那样，而是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們是在他們受其制約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現實关系基础上創造着的，在这些現實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經濟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而經濟条件归根到底終究是有决定意义的，是构成为一个鮮明綫索以貫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令人能理解到，这个发展进程的。

（“恩格斯致施塔尔肯堡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6年莫斯科中文版，第505頁）

經濟关系反映为法权原則，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立起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意識不到的；法

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驗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无非是經濟的反映而已。这样—來，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至于这种歪曲——而它在尚未被揭穿以前是始終造成那為我們所謂的思想觀點的，——又对經濟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內改变它，我以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拿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來說，繼承权的基础是經濟的。尽管如此，也很難于証明，譬如說在英国立遺囑有絕對自由，而在法国对于这种自由有严格限制，这在一切細节上都只是出于經濟的原因。然而两者都对經濟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两者都影响于財产分配。

（“恩格斯致施米特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94—495頁）

法权也是如此。当造成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成为必要的时候，立刻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門，这个部門虽然一般地整个依賴于生产和交換，然而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門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国家中，法权不仅应当适合于一般經濟状况，不仅应当是它的表現，而且还应当是不致因有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諧和一致的表現。而为了达到这点，經濟关系反映的确切性便是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不是把一阶级統治情形表現得很鮮明、不加緩和、不加歪曲，則上述那种現象也就愈常見。否則就会是跟“法权觀念”相矛盾了。……这样，“法权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是在于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經濟关系直接轉变为法律原則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权

体系，但后来进一步經濟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經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进到新的矛盾中。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93—494頁）

## 二、消灭私有制問題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說，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话来表示出来：消灭私人所有制。

有人責備我們共产党人，說我們要消灭人們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你們說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嗎？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們去消灭；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着它。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頁）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定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

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只要市場經濟尚繼續存在，只要貨幣的權能和資本的力量尚繼續保持，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能消灭不平等現象和剝削制度。

（列寧：“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鬥爭”，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0卷，第404頁）

利用資產階級所建立的法制時代，將為偉大的革命戰鬥時代所代替，并且就問題本質上說，這戰鬥要破壞資產階級全部法制，要破壞資產階級全部制度，而就形式上說，這種戰鬥應該在資產階級力圖擺脫它所建立的并為它所不能忍受的法制那樣慌張之下來開始的（也在開始着）的。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8卷，第284頁）

### 三、消灭階級和平等問題

然而，市民階級引起了無產階級的出現在它的反對方面，跟着又惹起了新的階級鬥爭，它已經在市民階級尚未充分获得政治权力以前就爆发了，好象市民階級曾在和貴族作斗争中还暂时照傳統原样施帶了神學的世界觀一样，無產階級最初也从它的敌人手里繼承了法學的世界觀，从其中尋找了武器来对付市民階級。無產階級最初結成的黨派，

它的理論的代表都彻头彻尾站在法学的“权利的地基”上。不过，他們筑起的“权利的地基”是和市民阶级的“权利的地基”不同的别样东西。一方面，平等的要求被扩充了，成了必須用社会的平等来补充法律的平等了，另一方面，从斯密·亚当（斯密·亚当为英国资产阶级早期的著名經濟家——編者注）的命題，即“劳动虽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但劳动的生产物必須从劳动者手中分配給地主和資本家”中引出了下述結論，即“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須廢止，或者至少必須改正为劳动者有利”。然而，把問題寄托在单单的法学的权利的基地上，并不能够除去资产者资本主义，尤其近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酿成的禍害……

只有他們（指工人阶级——編者注）除下了用法权来着色的有色眼镜，来看事物在它的現實的姿态中，才可能完全亲自認識它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形。然而，什么帮助了他們的这个認識呢？那就是馬克思所发見的唯物主义的歴史观……就是：无论关于法权、政治、哲学或宗教，人类的一切观念，在其終极的阶段上，会从他的經濟的生活条件中，即从人类生产与交換他們的生产物的方式中，被引导出来。这样一来，就得出了一个世界觀适合着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条件；只有在劳动者的头脑中沒有幻想，才得舍劳动者的无财产。現在这个无产者的世界觀正在作遍历世界的旅行。

这两个世界觀的斗争現在还繼續着，这并非不可理

解，它們不仅在无产阶级与市民阶级中间，而且在劳动者们中间；即在想法比较自由解放的人与还受旧来传统所支配的人中间继续斗争着。

據說，至今的社会主义者们把他們的行程弄錯了。他們恰正忽視了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有离开无止境的国民经济的博爱的議論，被改变成冷靜的法权概念”，只有脫掉一切“国民經濟的粉飾”，“社会主义法权的研究”，“对現代法权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才得到头緒。（此段系套用资产阶级法学安通·孟格博士的話——編者注）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关键恰正是經濟关系，首先是工錢劳动和資本的关系。經濟是科学，而且比法权哲学更加科学些。因为經濟处理着事实，不象法权哲学那样单单处理观念而已。不过，这件事对专门法学家毫不相干。他以为經濟的研究和博爱的演說可以并排在一起，但即使世界顛倒过来也好，法权必須当作法权通行。

又如在馬克思那里“經濟的粉飾”——我們的法律家最嫌忌它——还不只是单单經濟的研究而已，它从根本上是历史的。它确定社会发展的道路，从中世纪封建的生产方式到今天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方式为止，它确定着阶级的对立，旧阶级的没落，新阶级的形成，跟着带来了新的利害对立，它的表現在种种方面，尤其是被表現在新的法权的要求中。关于这件事情，我們的法学家（指安通·孟格博士而言——編者注）似乎多少感覺到了……今天的

法权哲学，在本質上除了历史地被傳交下来的法权状态的模写以外，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可以称为资产者的法权哲学，在这对面，无产阶级的法权哲学用社会主义形式并排地站起来了。既然如此，那末，它的原因是是什么呢？

“资产者”及“无产阶级”既各有其独特的法权哲学适应其阶级情况，那末，这两个阶级究竟从何而来呢？从法权中呢？或是从经济的发展中（产生）呢？并且，马克思除了說：“各个巨大的社会阶级的法权观乃表示着該阶级一时一时的阶级情况”之外，还說过别的事情嗎？

（恩格斯：“法律家社会主义”，見“新建設杂志”，

第1卷第7期，第14—15頁）

这种氏族制度，尽管极其幼稚简单，該是一种何等美妙的組織呵！沒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国王、总督、知事和审判官，沒有监狱，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条理井然。一切紛爭和誤会，都由有关者集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是很少运用的极端手段，而我們今日的死刑就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态，不过带有文明的一切利弊罢了。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要知道家庭經濟都是由好多家庭共同和共产主义式經營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經濟暂时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这样臃肿龐杂的管理机关。一切事情都由有关者自己解决，而在大多数場合是历来的习惯已把一切調整好了。貧穷困苦的人是不会有的，因为共产制經濟和氏族都知道本身对老者、病

人以及战争殘廢者所負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內。還沒有奴隶，因为一般還沒有奴役異部落的現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50—251頁)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里面，給与公民的权利是跟他們的财产状况相吻合的，这样就直接地宣告国家乃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贫穷阶级以保护自己的組織。在依照财产把公民分成几类的雅典和羅馬那里，就已是如此的。在政治地位由占有土地多寡来决定的中世紀封建国家里面，也是如此。这也表現于現代代議制国家的选举資格上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19頁)

在現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費表現在有錢人濫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談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許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簡直是荒唐的浪費現象。但是請你們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館、富翁的內室，然后告訴我，許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絕的小天地中而必須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費。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車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鐘他們是真正用来使他們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們的主人易于自由地發揮和利用自己

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鐘點他們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們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馬車的侍从座上，滿足主人的癖好，牽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們不再成为老爷們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費在服侍人們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轉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0—611頁）

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來，關於一般平等（其中也有民族平等）問題之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乃是這一民主制所特有的現象。資產階級民主制在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示有产者与无产者間，剝削者与被剝削者間在形式上或法权上的平等，借此来极端欺騙被压迫阶级。資產階級借口彷彿個人絕對平等，而把本身上就是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一种斗争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思也就只是要求消灭阶级。

（列寧：“民族与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90頁）

恩格斯說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証明我們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图用他們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談来責备社会主

义者。但是他們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識分子有时裝腔作勢，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內容，尽管他們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間的阶级差別。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农之間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來解釋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爭論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間的阶级差別还存在，我們就談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备，以免帮助了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

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322頁）

誰承認阶级斗争，誰就应当承認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資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資本論”（你們在口头上都是承認這本書的）中，千百次地闡